



周勛初先生八十壽辰紀念專號

古典文獻研究

(第十一輯)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主辦

GuDian WenXian
YanJiu

周勛初先生八十壽辰紀念專號

古典文獻研究

(第十一輯)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主辦

GuDian WenXian
YanJiu

國家“985工程”“漢語言文學與民族認同”
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項目資金資助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典文獻研究. 第十一輯/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編.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643-952-4

I. 古… II. 南… III. 古文獻學—中國—叢刊
IV. G256.1—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35643 號

- 書名 古典文獻研究(第十一輯)
編者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
責任編輯 卞岐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照排 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刷 南京大眾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浦口區大橋北路京新村 546 號 郵編 210031
開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張 19.5
字數 562 千字
版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80643-952-4
定價 50.00 圓

(鳳凰出版社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主 編 程章燦

編輯委員會 (按姓名音序排列)

曹 虹 陳尚君 陳正宏

程章燦 叢文俊 杜澤遜

郭英德 姜小青 劉玉才

劉躍進 徐 俊 徐有富

張湧泉 趙生群

執行編輯 趙 益

前 記

本輯為周勛初先生八十壽辰紀念專號。

周勛初先生是當代著名學者，他治學範圍廣博，涉及諸子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中國古典文獻學、近現代學術史等學科領域，在先秦諸子研究、楚辭研究、魏晉南北朝唐代文學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及近現代學術史等方面都有精深研究和重要成果，並對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早在 2000 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就推出七卷本、洋洋 260 萬字的《周勛初文集》，收錄《九歌新考》、《〈韓非子〉札記》、《韓非》、《張鷟〈文士傳〉輯本》、《〈文心雕龍〉解析》、《中國文學批評小史》、《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高適年譜》、《詩仙李白之謎》、《唐詩文獻綜述》、《唐人筆記小說考索》、《唐代筆記小說叙錄》、《當代學術研究思辨》、《西學東漸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無為集》等 16 種專書，煌煌巨著，蔚為壯觀。2000 年以來，已逾古稀之年的周先生還在不斷推出新的成果，令人興奮之餘，尤其欽仰不已。

周勛初先生繼程千帆先生之後，擔任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多年，現任名譽所長。他為本所的學術規劃與全面提升作出了巨大貢獻，至今仍一如既往地關心本所的發展。今年 4 月，周先生將歡度八秩華誕。本輯集刊特別登載周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小史〉香港版序》、《關於〈文選集註〉第九十八卷的流傳》二文，並專門刊發《周勛初先生著述一覽》，以供學界同行研讀之助。

2006 年，由周勛初先生主持的重大古籍整理出版項目《冊府元龜》

(校訂本),經過本所及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諸位同仁歷經十三年的艱苦努力,终于在鳳凰出版社出版了。2007年,該書榮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十年辛苦不尋常”。本輯特別刊發由該項目副主編姚松先生撰寫的《〈册府元龜〉(校訂本)編撰始末》,并同時刊發陳尚君、卞孝萱、傅璇琮、安平秋、程毅中、許逸民、郁賢皓、陶敏、躍進、李德輝諸先生所撰書評,以便學界同行更好地瞭解和利用這一古籍整理的新成果。

中古文學與文獻研究歷來是本所的重點研究方向,作為“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專刊”之一,《册府元龜》(校訂本)就是本所在這一方面向學界所作的最新奉獻。在本輯集刊中,我們還設立了“中古文獻與社會文化研究”、“文學與文學文獻研究”等專欄,也有意凸顯我們的這一方面特色。至于古典文獻學中的目錄、版本、校勘以及輯佚之學,當然更在本刊的涵蓋範圍之內。作為近年來學界的一個新熱點,海外漢學研究正引起越來越多學者的注目。我們認為,海外漢學研究不能只是單方面簡單介紹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更應該包括對這些成果的評說,還應該關注海外學者對國內學界的反應,總之,是應該在中外學術界之間真正發揮溝通與交流的作用。——以上諸方面,本輯都有文章涉及,相信也都會引起學界同仁的興趣。

程章燦記于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

2008年1月8日

目 錄

特 稿

- 《中國文學批評小史》香港版序 / 周勳初 (1)
關於《文選集註》第九十八卷的流傳 / 周勳初 (7)
附：周勳初先生著述一覽 / (9)

中古文獻與社會文化研究

- 作為匹夫的玄聖素王——識緯文獻中的孔子形象與思想
/ 徐興無 (21)
論東漢周禮學興起的文化問題 / 許 結 (43)
論班昭《女誡》及其創作背景 / 俞士玲 (66)
地下主者·冢訟·酆都六天宮及鬼官——《真誥》冥府建構的再
探討 / 趙 益 (97)
從朝鮮半島上樑文看敦煌兒郎偉 / 王小盾 (114)

文學與文學文獻研究

- 《洛陽伽藍記》與漢晉辭賦傳統 / 曹 虹 (142)
庾信《楊柳歌》釋論 / 朱曉海 (152)
宋代佛教徒所謂歐陽修“敬明教服圓通”之說辨正 / 嚴 杰 (188)

- 佛藏中的宋代文學史料——以南宋宗曉所編《四明尊者教行錄》
為例 / 卞東波 (196)
- 從《全明詞》、《全清詞·順康卷》失收詞看明清詞總集之編纂
/ 周煥卿 (223)
- 《四庫全書》與金聖歎關係考論 / 朱光立 (237)
- 課讀圖與文學傳承中的母教 / 徐雁平 (247)
- 師承授受與浙西立派——曹溶與吳陳琰 / 張宏生 (270)
- 清代文學駢、散之爭與阮元“文言”說 / 馮 乾 (278)
- 俞正燮《〈文選〉自校本跋》辨證——兼論《文選》的《報任少卿書》
和《答客難》與《漢書》之關係 / 力 之 (295)

古典文獻學研究

- 關於《舊唐書》點校本修訂的意見 / 武秀成 (310)
- 《經義考》續補諸作考論 / 張宗友 (319)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全漢志傳》 / 石 旻 (337)
- 葉德輝補注《漢書·藝文志》 / 羅 瑛 (344)
- 柳詒徵與國學圖書館 / 徐有富 (355)

文獻輯存

- 《全宋文》補遺(上)——以《蟠室老人文集》為中心 / 張洵
金程宇 (374)
- 陳訐《杜詩詳注》批語輯錄 / 劉重喜 (406)
- 《全清散曲》(增補版)補遺 / 范春義 (435)
- 汪辟疆先生《清人詩集可以觀覽者略存其目》書後 / 張亞權 (442)
- 《畫蘭箎歌贈梅郎畹華》小箋 / 鞏本棟 (448)

海外漢學研究

- 論《搜玉小集》 / (日)伊藤正文 撰 李慶譯 (454)
- 作為文本的漢代石刻——讀《漢代石刻集成》 / 程章燦 (479)

《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史》譯後記 / (日)高津孝 撰 俞士玲 譯 (489)

學術叢札

- 《詩·小雅》辨詁三則 / 閔 豐 (492)
 《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校讀札記 / 趙陽陽 (497)
 《大唐傳載》箋證三則 / 段麗惠 (505)
 《唐會要》校勘拾遺 / 邢永革 (508)
 《新唐書·藝文志》校誤 / 趙庶洋 (513)
 王昌齡死因論析 / 何 蕾 (519)
 《雲莊劉文簡公年譜》補正 / 林日波 沈曙東 (528)
 周亮工晚年焚書日期確考 / 陳聖宇 (541)

書 評

- 古代類書整理的重大收穫——評校訂本《冊府元龜》 / 陳尚君 (545)
 從新出版的《冊府元龜》校訂本說到開發其寶藏 / 卞孝萱 (562)
 古籍整理領域的一大收穫 / 傅璇琮 (571)
 整理中國古典文獻的範例 / 安平秋 (572)
 喜見點校本《冊府元龜》的問世 / 程毅中 (574)
 近百年來古籍整理圖書史上的典範 / 許逸民 (577)
 溯史料本源 循學術規範——評《冊府元龜(校訂本)》 / 郝賢皓 (582)
 古籍整理工作的新成果——讀點校本《冊府元龜》 / 陶敏 (588)
 《冊府元龜》中的秦漢史料 / 躍進 (591)
 漢唐文獻整理的標識性成果——評點校本《冊府元龜》 / 李德輝 (596)
 《冊府元龜》校訂本編撰始末 / 姚 松 (604)
- 《清代文學研究集刊》第一輯目次 (544)

《中國文學批評小史》香港版序

周勛初

歲月如流，轉眼已到八十高齡。人到老年，常是回憶過去。今應香港三聯書店之請，為即將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小史》作序，不禁又想起有關這書的許多往事。

我們這一輩人，生當社會劇烈震盪之時，“革命”不斷，“運動”不歇，但在有些人說來，卻又似乎風平浪靜，國泰民安。我因薄有著述，在當今的學生看來，就像是舒舒服服過了一輩子，終日關在書齋內，伏在灑滿陽光的書桌上，不斷著書立說的一個時代寵兒。實則在我寫作的每一本書中，都有一些離奇曲折的故事，為此我已為幾種著作的產生介紹過時代背景，在此也不妨對《小史》的問世說明一些情況。

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老師中有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新興學科的奠基者羅根澤先生，只是這一課程在新中國成立後已經停開，因此羅先生沒有教過我批評史。他只教過我一年文學史。其時我已患了好幾年肺病，平時常躺在牀上休養，學習很差，真是辜負了包括羅先生在內的許多老師的教導。

但到1958年時，中國文學批評史課卻又突然走紅起來。原來這時社會主義陣營發生分裂，中蘇糾紛尖銳化，中國急於消除“老大哥”的影響，在教育領域內要對“蘇修”的各種思想徹底消毒。新中國的政治領導人一向重視老百姓的思想教育，然而前此高等院校中文系的文藝思想卻一直以蘇式理論為指導，這時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部副部長周揚便挑起重擔，組織編寫各種大學教材，要用毛澤東思想統率一切。就文藝

思想而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主要闡發的是針對當前文藝界各種問題的方針政策,這時為了強調中國各方面的獨立自主,理論上還要尋找傳統的依據,於是寫作新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提上了議事日程。

中國建立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學科的幾位元老其時都集中在復旦大學與南京大學。周揚便讓兩校各編一種批評史與古代文論選。這時郭紹虞先生與朱東潤先生便起到了重要作用。郭先生在中共華東局的大力支持下,還集中了多位學養深厚的外校教授,住進上海國際飯店,先後編出了《中國歷代文論選》三卷本;而在劉大杰教授與王運熙教授的領導下,先後又編成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三卷本。通過這些大項目的鍛煉,復旦大學中文系培養出了一大批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年輕專家。中國步入改革開放之後,他們先後編出了《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系列叢書》七卷本和《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兩卷本。其後很多學者還出版了專題研究著作多種,成績可謂洋洋大觀。

相映之下,南京大學的情況不免陷於淒涼。第一本《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撰寫者陳中凡先生已是七十高齡,無法投入突擊,羅根澤先生患高血壓與肝硬化,也已無力緊跟形勢。況且前時展開“拔白旗”運動時,羅先生被列為主要批判對象,這時心有餘悸,思想上也轉不過彎來,因此處在大躍進運動中掀起的大批判之後,轉入大編教材之時,羅先生便再也調動不起積極性,即使參加會議,也只是稍作敷衍便了事。

大編教材前期,我被吸收進《中國文學史》的編寫隊伍。所謂學生大編教材,實際上有年輕教師與研究生參加,而且往往擔任主力。南京大學組織了好幾個班子,分別編寫各種教材。後來發現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編寫隊伍力量過弱,遂把我抽調了過去。這時我的身份還是先秦兩漢文學的副博士研究生,入學後一直在跟導師胡小石先生學習甲骨文與金文,這時胡先生又應同學譚優學之請,正在講授“楚辭”,為此我當然不肯輕易放棄聽課。廁身大編教材的隊伍中,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

南京大學大編教材的陣勢也可謂轟轟烈烈,結果可是不妙。同學大編而成的批評史,開頭有的同學還頗為自我欣賞,還想送到文壇大佬郭沫若那裏去領回幾句好話,結果落了個空。其後我與其他兩位年輕

教師合編了一種文論選，送到一位老教師那裏去審訂，結果石沉大海，成了一堆廢紙。為了編這兩種書，我卻是浪費了不少精力。

到了1959年時，系裏把我改為助教，讓我立即去上中國散文選等課程。這時各校都已紛紛開設中國文學批評史課，我校本在老大學的行列，這時自不甘落後，可羅先生已無法再上講堂，於是系領導讓我立即去開這一新課。

中國文學批評史是五年級的課程。我在大學畢業之後做了兩年多行政幹部，回校當研究生也僅兩年，而且大部份時間用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反右派、交心、大批判、拔白旗、大煉鋼鐵，以及平時的大搞衛生，加上中間穿插進去的打蚊子拍蒼蠅“除四害”等任務上，這時倉促上陣，壓力很大，但已成了過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

郭紹虞、羅根澤、朱東潤三位先生的著作已嫌觀點陳舊，同學大編而成的革命著作又嫌粗糙，我就只能邊學邊幹。這時畢竟還年輕，肺病已癒，平時讀書還算用功。這樣一連教了四年，同時講授《文心雕龍》。其中有半年輪空，我就每天上南京圖書館讀書，認真積累原始資料，編成了一種《中國文學批評重要專著篇目索引》。

應該說，我的這段學習經歷還是效率頗高的，前後寫了幾篇稿子，《梁代文論三派述要》一文發表在《中華文史論叢》第五輯上，說明我在古代文論的領域中還是可以佔有一席之地。只是這時已經處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極左思潮排山倒海而來，我的這一篇文章，可以說是僥倖漏網，其後還會在臺灣的多種學術選本中轉錄，簡直有些不可思議。

1964年時，教學工作結束，下鄉去上階級鬥爭的主課，投入四清運動。1965年回城，校領導又忙著動員師生到溧陽去辦分校。1966年時，“文化大革命”爆發，千千萬萬的中國知識份子整整浪費了十年生命。像我這樣的一名白色小知識份子，自然處境艱難。前後數年，渾渾噩噩，先是充當批判鬥爭對象，後是下農場走五七道路，身心交困，度日為難。家中的書都已奉命上繳，因此已與中國文學批評史徹底告別。

但我的身份本屬使用對象，正像列寧所說的，已是擰在教育機器上的一隻小小鏢絲釘，政治任務到來時，還是可以廢物利用，因此“文化大革命”後期又開始忙起來。一會兒編《辭海》；一會兒被吸收進《馬恩列

斯文藝論著選讀》的編寫工作，為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一段文字和斯大林《給高爾基的信》作註；一會兒參加“評法批儒”，註釋法家著作《韓非子》。這可不是生來就是打雜的命麼，突擊之餘忙裏偷閒卻也寫下了不少劄記。

就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來約稿，讓我為他們的一套暢銷書“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編一本《中國文學批評簡史》，我就利用四年講課時逐步修改而成的講義，很快寫出了初稿，但還沒有來得及交出，橫掃傳統文化的“大革命”就爆發了。

我前期寫的好幾本書，情況大體相同，都是在運動的間隙中搶著趕出來的。大躍進隨後帶來大饑荒，接著有三、四年較穩定的時期，所謂調整階段，《中國文學批評簡史》就是在“調整”的過程中見縫插針寫下來的。

“文化大革命”結束，情況逐步好轉，但我已不再去教中國文學批評史課，因為已有其他專職教師承擔，我就不斷轉變方向，應付各種突發任務，如三次參加高考出題等。這時我就抽空整理先前寫下的幾部稿子，於是在1980年時分別出版了《高適年譜》與《韓非子札記》二書。

正在這時，偶然看到一份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出版通訊，云是敏澤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一書已經訂入明年的出版計劃，這倒使我緊張起來了。“文革”之後，出現書荒現象。上海古籍出版社（其前身即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急著抓前此的約稿計劃，讓我把《簡史》的初稿寄去，只是過後不久就退回來了，說是內容與體例均不合。這也不奇怪，畢竟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寫的麼，事後看看腔調都不對，我也不以為意，忙著幹其他工作，因此稿子一直閑放著。這時看到有另外一種批評史要出版，也就感到不能再大意了。通史一類著作，基本材料大體相同，這時我已決定把《簡史》改名《小史》，“小史”的內容必然要比人家的著作少得多，假若二者出現相同之處，那就難逃抄襲的嫌疑。為此我必須搶在別人出書之前，一年之內把自己的書趕印出來。

經過程千帆先生的介紹，《中國文學批評小史》終於搶著與人同步，1981年時在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學界風起雲湧，一片繁榮氣象。“文化大革

命”之後，壓抑下的創造力一下子爆發出來。中國文學批評史類的著作先後出版了一、二十種，其中有個人著作，也有集體編寫的，篇幅一般都很大，我的這本《小史》，薄薄的一小冊，擠在裏面很不起眼，但八千本書不久就賣完了。這也說明它還是具有一些優點，能為學界所接受。

1986年時，我赴汕頭大學參加韓愈學術討論會，遇到新加坡國立大學講授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楊松年先生，承告已把《小史》列為教學主要參考書。當時頗感詫異，原來此書竟已“走出國門”了。

1991年時，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主辦的“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國際會議”上，從臺灣大學張靜二教授提交的論文中，始知彼處崧高書社已經出了一種《小史》的盜版。隨後我在前來學習的一位韓國博士生那裏，又看到了一種盜版的《小史》，不知是在韓國還是在香港印刷的？只是將長江文藝的版本加以影印，其他未留絲毫痕跡。臺灣的盜版書印得很差，我就想到，可以出一種正規的書去替代它，於是請高雄的麗文文化公司出了一種新版，然而我於1995年、1996年去臺灣開會時，卻是發現盜版書、新版書在書店中並列出售。朋友告訴我，應該見怪不怪。你想制止人家盜版，就是請律師去打官司，得到的賠償還不夠支付請律師的費用，因而不必勞神，一切得順乎自然。

這時大陸書架上也缺書已久，於是遼寧古籍出版社在1995年時又出了一次新版。2000年時，江蘇古籍出版社為我出了一套《周勛初文集》，又把《小史》納入其中。2007年時，復旦大學出版社又印了一種新版。就在此書即將出版時，北京一家很出名的出版社來與我商量，打算印行《小史》，當我告知復旦大學出版社已捷足先登時，來人表示遺憾。

隨著國際交往的日益開展，我曾先後多次至東亞地區的許多地方開會或講學，得知香港大學、日本奈良女子大學、韓國的首爾大學以及其他多所大學都曾用作教材。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時任韓國首爾大學東亞文化研究所所長的李炳漢教授來南京大學訪問，他熱情奔放，與我一見如故，還把我拉到一邊，說：“漢城大學（當時大家都用這一名稱）是韓國最著名的大學。用你的著作做教材，是很光榮的。”聽到這話，真有受寵若驚之感。

1993年，韓國外國語大學全弘哲先生等三人將《中國文學批評小

史》譯成韓文，由理論與實踐出版社出版。2007年，日本鹿兒島大學高津孝教授將之譯為日語，由勉誠出版社出版。或許可以說，這也是頗為難得的事，說明這一《小史》至今還能為世界各地的讀者所接受。

這些年我一直在想，為什麼這本貌不驚人的《小史》在大浪淘沙般的潮流中未遭淘汰，還能夠取得較好的效應，分析起來，下列幾點似可供大家參考。

一、正確定位。寫一種書，要有個人的特點，不要千篇一律，與其他人的著作大同小異，這樣很難脫穎而出。現在學生負擔很重，不大可能啃大部頭的書，我的這本《小史》，向“少而精”的方向努力，寫得還算簡明扼要，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知識，滿足本科生學習和碩士生、博士生考試時的需要，或許由此得到大家認可的吧。

二、不要花哨。現在的人總是喜歡高談理論，而理論界的情況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老是此起彼伏，變化多端。有的學者喜歡介紹時髦理論，他們寫的著作，像是在用中國古代文論去為洋式理論作注腳，這樣常是鬧得不倫不類，讀起來很吃力。我就想到，寫書不能故作高深，用平常心去對待，努力做到深入淺出，反而會受到讀者的歡迎。

三、注重原文。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人，最好接受一些清代樸學的訓練，一切從文獻出發，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不要渲染，不能拔高。既是寫史，還要把史料串起來，勾勒出一條清晰的線索，儘量講清前因後果，好讓讀者有所啟發。

上述云云，當然卑之無甚高論，錄之僅供參考。但我自覺慶幸。三、四十年前的一本小書，居然還能流傳至今，有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對此我還有那麼一點人生感悟，為人不必大紅大紫，像當年的一些培養對象，政治條件優越，成長環境良好，輕鬆愉快過日子，結果卻未必會有什麼預期的成就。而作為一名使用對象，儘管像是棋盤上的一隻小卒，任人擺佈，到處拋擲，東一榔頭西一棒，談不上什麼專業方向，但只要認真對待每一項工作，一步一個腳印，努力使自己的知識深化與系統化，儘管辛苦些，也未必做不出成績。當然，在我人生旅程中最大的慶幸，是在步入中年之後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否則一切不堪設想。

關於《文選集註》第九十八卷的流傳

周勛初

范志新先生對《文選集註》殘卷在中國的流傳作過一些分析，認為《文選集註》第九十八卷並非海鹽張氏舊物，而是楚中楊氏即楊守敬的舊藏。此說有誤。^①按日本學者關靖所編《金澤文庫圖錄》^②和阿部隆一所編《本邦現存漢籍古寫本類所在略目錄》^③上的記載，《文選集註》第九十八卷的原藏者為張元濟。《金澤文庫圖錄》已將《文選集註》第九十八卷末頁書影輯入，在書影下端說明中標示“上海張元濟氏藏”。此書乃請京都小林寫真部製版，關靖與其主人小林忠次郎熟識，而小林即受大阪某會社之托，請董康代向上海某君（當即張元濟）洽購《文選集註》者，事見董康《書舶庸譚》卷八下民國二十四年（1935，乙亥）五月十三日日記。由此可知，《圖錄》中之書影當為董康或小林所提供。阿部曾於1970年與1971年兩次赴台灣訪書，與該地中央圖書館原善本部主任後任臺灣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昌彼得等人熟識，自能瞭解到《文選集註》殘卷的來龍去脈。當年田潛在日本時除購得《文選集註》殘卷之外，還購回了宋黃善夫《史記》三家註本七十二卷，後均售與北京正文齋

① 載《文選版本論稿》下編：寫本編《關於〈文選集註〉編纂流傳若干問題的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② 載《金澤文庫圖錄》上冊七一《文選集註》，日本幽學社1935年9月出版。

③ 載《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日本慶應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編，日本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1月出版。

書肆。正文齋將《史記》與《文選集註》殘卷拆開、分截後出售，張元濟于清宣統季年于正文齋中購得《史記》三家註本六十六卷，《文選集註》當亦同時購得。後《史記》歸涵芬樓，其後又歸北京圖書館；《文選集註》第九十八卷則輾轉流入了臺灣中央圖書館。楊守敬觀海堂遺物，大都收藏在臺灣故宮博物院，專家多人曾去查勘，未聞曾入藏《文選集註》第九十八卷；臺灣中央圖書館亦有部分楊氏舊藏，然未見有關於《文選集註》與楊氏有關的任何記載。^①

其書，得全型一書，其書名曰《文選集註》。此書之出，蓋由於
 前清宣統年間，正文齋中發見，得舊本一冊，非並卷八十八卷。《文選集註》
 劉詒周跋②《藏園書文叢金》錄此書開卷學本日誌③。吳音詒出。舊書
 《玉堂書文》，題為《文選集註》。《藏園書文叢金》錄此書開卷學本日誌④。吳音詒出。
 一八卷。《文選集註》。《藏園書文叢金》。前記吳音詒出。卷八十八卷
 九。"舊本。前記吳音詒出。"前記吳音詒出。不復書。其書名曰《文選集註》。
 四林小面，題為《文選集註》。林小面主人主其與。題為《文選集註》。
 吳音詒出。前記吳音詒出。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前記吳音詒出。其書名曰
 十且正(交△。2881)平四十二閱月不八卷《新書廣告》東董吳音詒出。其書名曰
 三。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
 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
 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
 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
 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
 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文選集註》。其書名曰

① 參看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汲古書院1983年出版。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臺灣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1年7月出版。今按：阿部所說的“中國”實指臺灣地區，故訪書之處集中在該地的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等機構。